

要 目

- 浙江家乡戏剧活动漫忆…… 戴不凡
我的艺术生涯…… 王传淞
我的老师竺素娥…… 王文娟
姚水娟的艺术道路…… 樊迪民
忆越剧故乡嵊县…… 范瑞娟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五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五輯

17153/4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3年8月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萧山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插页2 字数199,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1,200

统一书号：11103·92

定 价：0.87 元

前 言

浙江是戏曲的故乡。一部中国古代戏曲史，其中一半篇幅是与浙江有关的；在南宋时兴盛的南戏，其主要发源地在浙江；元明以来脍炙人口的杂剧，有许多出自浙江人之手；明代“四大声腔”的“余姚腔”和“海盐腔”亦源于浙江；据《永乐大典》载，中国最早的三部戏文之一，《张协状元》，是温州人的作品；我国著名的戏剧家高则诚、徐渭、凌濛初、祁彪佳、李渔、洪升、高奕等也都是浙江人。这就可以看出浙江在整个中国戏曲史上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了。

浙江现有地方剧种多达二十个。在我们这本选辑里集中刊载了比较著名的九个剧种的史料。其中，越剧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它现在已风靡全国、驰誉海外了。为什么它能从不登大雅之堂的“的笃班”崛起而成为仅次于京剧的全国性剧种？为什么当年嵊县山沟里的姑娘能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打开局面？为什么竺素娥能保持难得的“戏德”，为人楷模？为什么姚水娟能戴上“越剧皇后”的桂冠，步步春风？她们的后辈、现在蜚声舞台的王文娟、范瑞娟对此都在本辑中写了长文，作了第一手的叙述；尤可贵的是越剧史上第一位编导、现已八十九岁高龄的樊迪民（樊篱）也回忆了他和姚水娟等在“孤岛”苦斗、艰难创业的往事。这些有趣的而又含辛酸的史料，当然不只是供人茶余酒后的

谈资，而应当为戏曲工作者所借鉴。遗憾的是，在解放前后袁雪芬等所进行的卓有成绩的越剧改革的史料，在本辑中来不及收集。昆剧虽不是在我省生的根，但解放后却在我省开了花，王传淞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朴素、真实地写了从小就开始的独特的艺术锻炼和修养，正如他说的“此生惯走崎岖道，艺术从来路不平。”绍剧、婺剧，也各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他们众多的名演员动人心魄的坎坷身世和光彩照人的舞台形象，也将在本辑史料中保存下来。此外，如古老的甌剧、甬剧、姚剧、睦剧，也都有专文介绍。所有这些深深植根于人民土壤中的剧种，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深信，一定会焕发青春，重放奇葩！

本辑刊载的已故著名戏剧评论家戴不凡的长达五万余字的《浙江家乡戏曲活动漫忆》，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史料，又是一篇慧眼独具的奇文。它摆脱一切拘束，突破种种陈言，从亲见亲闻的事实出发，来考察戏剧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它也许会在戏曲研究中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但不管怎样，戴不凡的这种勇于探索、敢于开创的治学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戏剧可以说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一支轻骑兵。作为戏曲故乡的浙江，提供这辑戏剧史料，如果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效绵薄之力，则将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了。

参加这辑史料编辑工作的有曹湘渠、张明、王遂今、宋子亢。错误之处，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



越剧女小生们合影(一九八一年于上海文艺会堂)
 前排自左至右: 王水花、邢月芳、竺素娥、屠杏花、范瑞娟、许菊香
 后排自左至右: 曹银娣、邵文娟、王凤鸣、毕春芳、周雯芳、魏素云、张桂莲
 (小 菊摄)



竺素娥之「燕子笺」拾绣鞋



王文娟剧照



越剧界五世同堂



周越先演《雪里梅》



卓别林夫妇与范瑞娟

目 录

浙江家乡戏剧活动漫忆戴不凡(1)

徽州会馆为什么“赖戏” 乌龙庙的戏愿 兴
不起来的戏馆 乡下“出会”的终结 讨饭班
和赌博戏 关于睦剧 古式戏台 做戏的“老
规矩” 剧种及其变迁和剧团的关系 戏班子
里的情况 太子班 几个特殊剧目 从徽班
《跑城》看京戏商业化 目莲戏和道士

我的艺术生涯王传淞(77)

难忘的童年生活 进“昆剧传习所” 从“新
乐府”到“仙霓社” 肚皮空空也要认真唱
没有党的阳光幽兰早就枯萎 继承和发展昆曲
艺术的我见

我的老师竺素娥王文娟(107)

姚水娟的艺术道路樊迪民(樊篱)(136)

初到上海 初期舞台生涯 初演时装戏 获得
“皇后”桂冠 绍兴女子文戏正名为“越剧”
《纪念专集》 我与姚水娟忍痛分手 她的

个性 与竺素娥拆伙 一人饰二角 《泪洒相思地》
《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 姚水娟的
艺术修养

忆越剧故乡嵊县和姚水娟	范瑞娟(161)
绍剧概述	沈祖安(172)
婺剧初探	谭德伟(206)
周越先和《雪里梅》	夏 林(219)
瓯剧史略	叶大兵(224)
甬剧今昔	李 微 白 岩(255)
姚剧的诞生	姜枝先(262)
睦剧介绍	施振眉 洛 地(265)
杭剧小史	莫 高(275)

浙江家乡戏曲活动漫忆

戴不凡

前 记

一部清初以前的中国古代戏曲史，至少有一半篇幅是浙江的戏曲史。现有信史可徵的戏曲史上的完整开篇一页：“官本杂剧段数”，就是南宋杭州戏剧演出的一篇剧目单子。现知的最早南戏，是十二世纪末期的温州杂剧。现存的我国最古戏曲剧本《张协状元》（《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肯定是温州人作品。元初，北杂剧南下后，首创“南北合套”（昆腔中今天还在应用）的是杭州人“蛮子汉卿”沈和甫；杂剧中后期作家很多也是杭州人或在浙江活动过。元明以来，号称为“四大传奇”的《荆》、《刘》、《拜》、《杀》，除《刘知远白兔记》待详外，余三本肯定是浙江人所作。至于被誉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作者是永嘉人高则诚，这是稍有文学史知识的都知道的。明代戏曲“四大声腔”中，浙江独占其二（余姚腔、海盐腔）；伟大作家汤显祖的作品其实就是海盐腔剧本，他还和他家乡的一千多海盐腔艺人在一起活动过。明代万历以后，传奇作者纷起，籍贯几乎半是浙人。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吕天

成、王伯良、祁彪佳都是绍兴人。清初著名戏剧家李笠翁是兰溪女埠附近人，那一带，抗战前是昆腔和二合半唱得十分热闹的地方。这一篇简单的“帐”，可以看出浙江在整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虽然许多历史都成为疑莫能明甚或是湮没无闻的了，但是，这“半部戏曲史”上残留下来的某些痕迹，不是绝无影响可寻（特别在一些偏僻的地方），而是依稀可见的。要搞清楚戏曲史上某些很难搞清的问题，去研究这些残留的痕迹——活资料，这比到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或琉璃厂去找什么“善本”、“孤本”有用得多。先举个简单不过的例子：最早的南戏叫“戏文”（昆山腔的第一个剧本《浣纱记》中梁伯龙也还是自称“便见戏文大意”的）。这个词儿，在全国许多省市中，如不是看过戏曲史的人，是不易理解的；可是，杭州口语至今犹说“看戏文去得来”，而不像北京人只说“看戏”、“听戏”。无独有偶，至迟在南宋中叶已有大量戏剧演出活动的南戏另一家乡福建泉州一带，至今也习惯把戏叫做“戏文”。——这不是偶然的吧？宋元时期杭州、温州和泉州海上交通频繁，对戏的称法至今仍然一致，这是不是反映了当时浙闽之间的戏曲有互相交流情况呢？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向两位朋友分别开过同一个玩笑，我写下“呆木大”三字请他们念。一位用湖南口音念成了“d 𡵓 ai 木大 dai”；一位用上海口音念成了“呆 ai 木大 dai”。我说，如果到杭州、绍兴、建德去，连小学生也会说你这个戏曲史专家是“呆 ai 木大 du”！——《呆木大》是元末天台陶宗仪《辍耕录》著录的宋元院本名目“冲撞引首”中的一个剧目。和“官本杂剧段数”一样，《辍耕录》中这篇剧目帐单，专家学者翻破了书，也难解得其中一二。

然而，结合宋元时期戏曲活动中心的杭州一带口语来看，这个剧目的含意是豁然可通的——它不过是“二楞子”、“笨蛋”之意而已。——几乎无法理解的“冲撞引首”，多少是可以从中得悉消息一二了。戏曲史上不可或缺的南宋杭州杂剧演出体制：“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又有杂扮……即杂剧后散段也。”（《梦粱录》）什么叫“艳段”？治史者仍只能解释之为“寻常熟事”。但是，只要让杭州、绍兴、建德人略一思索口语中的“发艳”、“满发艳的”和“艳鬼”（建德话）之类，以及看台上小丑演出时赞赏他演得“真发艳”，那么，什么叫“艳段”，那是毋庸再去查考书籍的。这无非是滑稽小折子戏的古称罢了。至于演戏要有一定的体制，在金衢严三府也是有痕迹可寻的。说来话长，留待后述。

以上数例，我仅用以说明，一些在我们浙江人看来是毫不足异的、习焉不察的事，对于解决戏曲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却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我正是从这个角度才写下后面这些回忆的。比如说，中国戏曲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宋元叫来的勾栏、瓦舍（以至后来的戏馆）；但这只是大城市。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以及广大的农村又是怎么个情况呢？——几乎是史上的空白。西洋戏剧源于古希腊的祀神；中国戏曲的发展难道和迎神赛会没有关系么？大家相信戏曲的发展和城市商业（还有手工业）的繁荣有关，可是，两者之间具体关系究竟如何呢？……我不厌其详地写了以下这些片断的回忆，相信对于治史者是或不无一助的。但是，由于对家乡戏曲的有关情况了解本来不多，又加上二十多年来未曾回浙，某些事情又因许多前辈已经作古，无法再行调查核对，所记难免有很多错误和缺漏之处，尚希熟悉这方面情况的长辈们能予

以指正，并把他们更多的见闻记录下来。总之，这篇文章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一点作用，这就是我的最大希望了。

（一）徽州会馆为什么“赖戏”

我是旧严州府治建德县城（梅城）人。祖籍休宁隆阜，定居建德城里到我这一代已经是十四世了。但是，直到辛亥革命前，每隔五年还得去人到隆阜拜一次祠堂。因此，我们这样的“书香世家”仍是徽州会馆的成员。在我幼小时，“阿得（我们）徽州会馆”做的戏是最出名的。

徽州会馆做戏出名的原因，一在于做的次数多而又定期不误，每年二、十两月必做两回戏，一做就是十日十夜。此外，当听说别的会馆祠庙请来的班子好，它还经常去接戏箱来做。这和其它会馆祠庙一年只做一回，或两三年以至五年、十年才做一回，甚或“赖戏”者不同（定期该做戏而不做叫“赖戏”）。二在于不惜重金，上到徽州、东阳，下到绍兴、上海、宁波（那里原有唱昆腔的好班子）去专请“好班子”来做戏。这和其它会馆祠庙到期随便到别的祠庙会馆接戏箱，或者请个行头破破烂烂的“烂班子”来做几日，还一下“戏愿”也不同。三在于戏台好，虽不是最大的，可是红漆油油，柱子从上到下都描金涂碧，很考究；虽然露天，却四面有高墙，坐在高凳上也看得清、听得明。

到徽州会馆看戏，那和到别处看戏一样，不花钱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不过，祠堂和会馆做戏时实际上是存在着畛域的。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祖籍徽州的建德土著，除自己的会馆外，那只有府、县城隍庙和岳郎庙、乌龙庙……这

些本地人自己的祠庙以及自家“有份的”祠庙如祖师庙等处做戏时，才会不分日夜去看。外路人的会馆祠庙如天妃宫（福建会馆）、吴公庙（金华会馆）、绍兴会馆、江西会馆和宁波同乡会等等地方做戏，虽然也可以随意去看，但只是偶而去两三趟，并不十分愿意进庙门的。外路人对土著祠庙及其它会馆做戏，大多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所以，每逢会馆或祠庙做戏时，并不因为看戏不要钱而发生挤破会馆和祠庙的问题。至于“挤破徽州会馆”这句谚语，那只是一个形容词，仅仅表明这里做戏时看客特别多罢了，并不是真的。

像城里这样的会馆，在建德乡下某些埠头（靠徽江、兰溪江的码头）上也有。例如，马目埠就有江西会馆（后改为小学，四〇年我在这里还教了半年书）。我还记得，兰溪、金华一带原来也有许多会馆。这一带的会馆，和大码头、大城市的会馆——例如鲁迅及有关他的著作中所提到的北京的绍兴会馆，有很大不同。它们具有原始近古的性质。会馆全都拥有一笔不小的基金，它原是按同乡人自己量力捐助的；临时不足（例如每逢十年“菩萨开光”修理会馆时）则再捐募。捐助一可以向菩萨表示敬诚以求福祐；二可以在当地同乡和家乡扬名，因而连“阿得”徽州同乡商人，也都乐意量力而行。基金或用于购置田地房屋收租，或用于投资商店作坊入股取息。会馆同乡除单身汉外，不论贫富，每隔多年可以轮充“值事”一年，值事每年大约七或九人；除了灯节以后照例去吃一顿酒席以外，其实是虚应故事。一切实权多操纵在“首（执）事”一人或二三人手里，他们一般都是同乡中最“财主”的人家，或是以会馆为业的人。会馆都供有自己的菩萨，每年“菩萨生日”，凡是同乡每家都可以去一人吃酒肉一顿

（或发“面筹”二到四根“折席”——凭筹去面店吃几碗“片儿川”或“三鲜面”），此外的活动就是做戏。

从表面上看，会馆不过是同乡联谊互助性质的组织，实则不然，会馆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商业和手工业者，而他们一般全是按籍贯乡里分行分业的。例如，一般来说，徽州人都经营茶漆、竹木、柴炭（杭州一带的竹木柴炭原来几乎全是经建德运去的），绸布、京广货（日用品）、文具（徽墨）书店和饭馆之类。福建人主要在北乡种漆，在城里的则开漆行、染坊、颜料行和烟店。江西人经营夏布、纸坊、瓷器、豆腐坊，也兼营竹木柴炭。……

从外表看，城郊有牌号的商店不过一二百家，可是他们（以及不挂牌的行庄、作坊）之中大约五分之三以上都设有批货的大栈房和制造作坊，或两者兼而有之。例如，绸布店一般都自有染坊，还和专业染坊挂勾。五六家衣庄店堂里，看去不过四、五个伙计一个帐房（最大的一家也不超过十人），可店堂后面经常至少都雇有一、二十个裁缝，多的则达数十人，除了“洋车”（缝纫机）外，还经常把大量粗活（如缝夏布蚊帐、缝裤腰）委托邻近的家庭妇女计件论工缝制。建德另一特产“子陵鱼”（细小而味美，胜于海蜒），只一两家南货店公开出售，实际上，它们几乎是包购几百隻“鱼船上人”的生产。茶叶店（不包括春夏间季节性的许多茶庄）也不过三家吧，店堂内能看到的经常只有老板娘和一个学徒或伙计，可是，每家店堂后面或邻近的房子中，一年到头至少也有二、三十个姑娘每天在“拣茶叶”。……因为他们经营的并不是单纯门市零售业务（这方面的收入可说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不够老板一人伙食的），也不单只建德这个水

陆码头的一地业务，他们的触角还伸展到赣东、闽北，很多是“上运”“下销”商品的批发经营者和制造商。

由于这些业务不是简单的，他们从事的不单是从批发商那里批来商品转个手零售的简单手续，因而，各行各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颇为复杂的共同问题。这样，自然而然地同乡的同业者就各自结合成为“小组”，都到会馆中泡一桌茶或摆一席酒，大家到茶、酒桌上商量解决。这些全是到徽州会馆的茶、酒桌上决定和交流的。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却具有商业和手工业行会的性质。建德虽在民国初年就有商会，但那只是宣达政令、便于税收和摊捐派款的机构，各行各业的经营业务实际操纵在会馆中自己结合的“同乡小组”里。这情况大约继续到一九三四年左右才最后停止。——如果会馆中某些人（“小组”）今年生意兴隆，挣了许多钱，那么大家公凑一台三日三夜的戏——到乡下去接“抬戏箱”来会馆做一下，以示对纯阳祖师保佑发财之感激，这是很普通的事。

我记得一年两度由妈妈带着到徽州会馆坐在高凳上白日黑夜看戏，那是“蒋介石来了”（一九二七年）以前的事。从这以后，徽州会馆就开始年年赖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先是每年只做一回“十日十夜”的，后来则做一回“七日七夜”以至“三日三夜”的，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吧，请了个唱“大京班”的“烂班子”做了“三日三夜”以后，就没再正式为菩萨做戏了。原因是：徽州人都穷了，会馆也随之而穷了。一九三五年秋，原来应当是修会馆给菩萨开光大做“会戏”的，头年一场大旱把这计划全打破了。但是，单是“旱鬼”，那还不至于使徽州人穷得做不起戏的。

徽州人为什么会穷呢？原因很多很复杂。首先是政治上的。一九二六年阴历十二月“北佬”（我们对孙传芳军阀部队的恶称）逃走，全城连同近郊和一些“埠头”被洗劫一空，城里最精华的地段被烧成一片瓦砾场。“北佬”放火就是先从抢“恒懋”开始的；“恒懋”是徽帮集股开的，它原是徽州、严州两府最大的“京广货”和绸布门市兼批发店。这家相传在左宗棠把整个严州府城烧成废墟以后还有力量复业的几百年徽帮老店，从此消声匿迹了。不久以后，蒋介石在江西打红军，建德是交通要道，每经过一次“革‘命’军”就要百姓一次命，特别是派钱代伕（否则，路上行人会被任意拉去当挑伕），和在大溪（新安江）上搭建里把长的浮桥，上面可以推过很大很重的“洋炮”。钱，大部份就是由工商界和祠庙会馆分摊的，资力雄厚的徽帮自然首当其冲。

不过，单是政治上的直接原因，那也还不致使徽帮及其会馆穷了以至于不顾体面地“赖戏”的。这里面还有十分深刻的社会经济上的原因。谷贱伤农，农村破产，生意清淡，这是当时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可置勿论。值得一谈的是这一带的特殊性。

为了说明这个特殊性的问题，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地理情况，钱塘江的两大支流徽江和兰溪江在建德城东三里的严东关汇合，沿徽江而上，可通屯溪。沿兰溪江而上，一路可往汤溪、龙游到衢州，由衢州而上，可通常山、江山（往西就是玉山、上饶和弋阳了）；从兰溪向东南沿金华江而上，大船可到金华城外大桥，从金华起，中等船隻一路可到武义，一路可到义乌佛堂。从地图上看，这里是万山丛中。在浙赣铁路没有通车以前，兰溪原是一片“封闭地区”的商业中心，而建德则是这大片封闭地区通向下路（杭州）的大门。现在外省人看来，这一带无非是金华火腿和衢